

日藏《李长吉歌诗》钞本及批点本考述^{*}

童岳敏

李贺诗集在宋时已有蜀本、姚氏本、上党鲍本、京师本及宣城本，但多淹留不闻。后世流传广泛的是南宋吴正子本，为明清时期多种刻注本的依据，在古代东瀛也多有传衍。笔者曾查阅日本一些大学图书馆汉籍藏书的多种文献资料，偶得室町写本《李长吉歌诗》及王琦汇解《李长吉歌诗》的批点本，对李贺诗集的校勘释义颇有裨益，现对它们作相应的考述。

一、室町写本《唐李长吉歌诗》

此钞本封皮蓝色，题签为《李贺集》，书长35.5cm，宽26.5cm。一册，共五卷，现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。从题录及内容看，应是吴正子笺注、刘辰翁评点的合抄本。钞本目录页右上方有“慈照院”、“梅熟轩”朱文长方印各一枚，左上角是“京都大学图书之印”朱文方印，下方右角有“鹰司城南馆图书印”长方形印章，封面另有“足利义政公持本”及“诗文六笺”等字。足利氏卒于1490年，即明代弘治三年，以此推定，写本传抄的时间应在明代弘治之前^①。

足利义政公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，法名慈照院喜山道庆，晚年投身诗文、艺术及绘画等事业，造就了东山文化的辉煌。因此，“慈照院”印也应指足利氏之典藏。十五世纪期间，东瀛汉籍中“足利本”与“金泽本”齐名，明郑舜功称：“中国书籍流彼，多珍藏山城。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，以为聚书之渊薮。他库虽藏书，未及二库也。”^②下野文库即指足利氏所藏。鹰司氏，始兴于镰仓时期，江户鹰司信房秉权期间，家族兴盛，明历至贞亨年间复兴一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三至九世纪私学的发展嬗变与文学的关系研究”(11CZW031)成果之一。

①国内现存较早的吴正子笺注本及刘辰翁评点本有明天启刻本《李长吉歌诗》四卷《外卷》一卷(吴正子笺注)、明凌濛初刻闵氏朱墨套印本《李长吉歌诗》四卷《外诗集》一卷(宋刘辰翁评)及明激芬堂《李长吉歌诗》刻本(此刻本有吴正子笺注、刘辰翁评点及明张睿卿补笺)，从时间上看，室町钞本比国内的典藏时间更为久远。另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元代吴、刘笺评的袖珍合刻本。

②郑舜功：《日本一鉴》卷四，民国二十八年(1939)据旧钞本影印本。

时。“鹰司城南馆”盖其家族书籍典藏地。“梅熟轩”，是梶浦逸外（明治29年—昭和56年，1896—1981）的室号。梶浦逸外，临济学院花园大学校长，昭和19年正眼寺住职，妙心寺派管长，法名は宗実。可见，梶浦逸外曾拥有此书，据书中印记推测，梶浦逸外应在昭和36年前将钞本赠与京都大学。

此钞本年代久远，纸质泛黄，但字迹清晰。钞本目录分篇目四卷，另加外卷，下有附言：“鲍本载二十三首，今删去重出者一首，止计二十二首。”卷三目录漏抄《昌谷诗》一首，但正文中有该诗。比对室町本《唐李长吉歌诗》目录与正文诗歌抄录内容，发现多有讹误，如卷一中窜入本属卷四的《上之回》、《高轩过》、《贝宫夫人》、《兰香女神庙》等，卷四中又录有本应属卷三的《难忘曲》、《贾公闻贵婿曲》、《夜饮朝眠曲》、《王濬墓下作》等诗。窜误的诗篇是以整页的形式出现，这应是钞本书页散落后重新装订的结果。或许整理人员不懂汉文，而钞本又无页码标示所致，若加以调整，内容应能衔接。从钞本评点形式上看，多以日文的片假名来表音，这种表音形式在日本汉籍中极为普遍，如《马诗二十三首》其二中“御”字注为“ツラニ”，其六中“锯”字注为“ヘナル”。另诗题上方有朱“△”加以标示，诗句佳者侧标朱长点“、”，而极佳者则用双朱长点“、”加以突显，如卷一《李凭箜篌引》“石破天惊逗秋雨，梦入神山教神妪”、《还自会稽歌》“吴霜点归鬓，身与塘浦晚”、《春坊正字剑歌》“正是荆轲一片心”等。

按：古代圈点评注法在宋以后渐趋成熟，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载《宋真德秀批点法》中已有“点”、“抹”、“撇”、“截”之说，其中菁华傍点“、”，另《大明唐顺之批点法》中将“圈”分为“长圈”、“短圈”，“点”分为“长点”、“短点”，其中“长点”为精华，“短点”为字眼^①。清人唐彪《读书作文谱》中“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”有十三种批点形式，其中将“圈”、“点”结合标示诗文之佳处^②。此外，佳作也可用“○”标于诗题上头，极佳者则可标画多个“○”，如姚佺等笺评的《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》四卷中《李凭箜篌引》、《春坊正字剑子歌》等诗题即上标三个“○”^③。但纵观各种评点，汉籍中似无三角形“△”及双点“、”的批点。这或许是古代东瀛的批点形式。

钞本末页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，稍可辨认的有两条：其一，“□□四卷诗不如前两卷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卷四岂敢厌得意身少”；其二，“《唐李长吉歌诗》外卷：长吉诗如画眉带鬓，增益得所，明丽动人，非厚涂泽此也。然使年过三十将不异此，吾评不妄”（参见图一）。第一条因缺字过多，意不可解。第二条大意为李贺诗歌虽词藻艳丽，但皆妥贴准确，无矫饰之弊。查检四库吴本《笺注评点

①徐师曾：《文体明辨序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96—97页。

②唐彪：《读书作文谱》，王水照：《历代文话》第4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418—3419页。

③姚佺笺、丘象升等评、丘象随等辩注：《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第131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19、226页。



图一

李长吉歌诗》，未曾见这两条笺评。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〇《长吉诗集》的提要来看，明以来注李贺诗者有徐渭、董懋策、曾益等五家本及丘象升、丘象随、陈愫等六家之辩证，此外尚有孙枝蔚、蒋文通等七家之评，就时间而言，这些评注皆晚于室町钞本，或许因版本的不同尚保留与上述两条相似的评注？但翻阅凌濛初刻本《李长吉歌诗》，王琦、姚文燮、方扶南《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》，陈本礼《协律钩玄》及姚佺《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》等多种版本，皆无这两条批语。另据毛晋《汲古阁书跋·李贺歌诗编》、丘象随《昌谷集句解定本·凡例》以及明无名氏《唐李长吉诗集坊刻原序》的考辨可知，虽然不同刻本、训解及评点中有句、字、词的窜讹，但皆无这两条批语的记载与考订。据此推测：其一，室町抄本持有者是足利义政公，那么传抄的应是明代版本，甚至更早。考虑古代书籍流传之不易，钞本的底本是我国宋元时期刻抄本的可能性比较大^①。因此，此本可能更接近吴正子本的原貌。这两条批语因附在末页，容易毁坏，在我国也许散佚了，后世的各种刻本当然也就无从记载。其二，室町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混入了他人的评点，若是国人评点，或许是京师本、上党鲍本、临安陈氏以及明初版本的窜入，若为东瀛学者的评点，情况则更为复杂。

与宋蜀本、凌濛初刻本及王琦汇解本等相校，室町钞本中有散佚的内容。如钞本卷首著录了刘辰翁《评李长吉诗》部分内容，但从“正在理外”至文末“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”大段文字已佚，又外卷《汉唐姬饮酒歌》中吴正子的注文，钞本已是缺页散佚。此外，室町钞本外卷《感讽六首》其四注文中少了“郭一作”、“羹”；其五注文中少了“婕妤”、“新”及“怀”等字^②。虽然室町本部分内容已经散佚，但钞本还是有相当的校勘价值，兹列异文之处如下：

1.吴正子本《秦王饮酒》“宫门掌事报一更”的“一”，室町本作“二”。

①李贺诗歌的宋元钞本在明清时期也曾有流传，如钱曾即有吴正子本《李长吉歌诗》的元钞本，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“吴正子笺注李长吉歌诗四卷诗外集一卷”云：“此书是元人旧钞，潘君显夫赠予，君讳荣，别号郭指，平生交唯孟鬼先生、石林长老与予三人，著《法苑绀珠集》，牧翁极称之。”

②若传抄的是刻本，不应该出现这种简单的漏字情况，可见室町传抄的底本也是钞本。

按，宋蜀本、凌本及姚、王诸本皆作“一更”，方扶南《批本李长吉诗集》云：“宫门掌事报一更，即鸡人报晓筹也。一更为六更之误。”王琦释：“《旧唐书》，宫门郎掌内外宫门锁钥之事，报一更，见卜夜未久之意。吕种玉《言鲭》引贺诗‘宫中掌事报六更’以证唐时宫漏有六更，不止五更之制。则似言彻夜宴饮之久，语句更觉连贯。然考诸本无有作六更者，不知吕氏所据。”古代夜晚一般以五更计时，颜之推认为“一夜五更”产生于汉魏时期^①。唐承前制，也以五更计数。六更之说始于宋代，杨万里《谢余处恭送七夕酒果蜜食化生儿》诗：“醉眠管得银河鹊，天上归来打六更。”原注：“予庚戌考试，殿庐夜漏杀五更之后复打一更，问之鸡人，云：‘宫漏有六更。’”又宋周遵道《豹隐纪谈》卷一：“杨诚斋诗云：‘天上归来有六更。’盖内楼五更绝，柝鼓变作，谓之虾蟆更，禁门方开，百官随入，所谓六更者也。外方则谓之攢点云。”^②可见唐时“宫门掌事报六更”应无历史依据。一更乃戌时，即黄昏时辰（晚上七点至九点），与上文“酒酣喝月使倒行，银云栉栉瑶殿月”所描述的酒酣夜阑、月映宫殿之夜景不甚相符。室町本作“二更”，即人定时辰（晚上九点至十一点），夜色已深，万物皆静，与上下文颇为吻合。此外，唐诗中多有“二更”之词，如王建《宫词》：“内宴初秋入二更，殿前灯火一天明。”成彦雄《除夜》：“吟鬓就中专拟白，那堪更被二更催。”刘得仁《秋夜寄友人》：“永夜无他虑，长吟毕二更。”等等，总之，室町本作“二更”义更佳，当依钞本校正。

2. 宋蜀本《上云乐》“羸女机中断烟素，断烟素，缝衣缕”。吴正子本作“羸女机中烟素素，断烟素，缝衣缕”，室町本作“羸女机中烟素断，烟素缝衣缕”。

按，凌本与吴本同，而曾益本、二姚本则为“羸女机中断烟素，缝舞衣”，王琦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卷四认为吴正子注本似非，而曾、姚本更妥。其实“烟素”在此盖为织锦衣裳之比拟，江淹《和班婕妤咏扇诗》云：“纨扇如团月，出自机中素。画作秦王女，乘鸾向烟雾。”故凌本、吴本“烟素素”不可解，曾、姚本“断烟素，缝舞衣”虽文意也通，但不及室町本的整饬连贯。

3. 宋蜀本《昌谷诗》“鸣流走响韵”的“响韵”，室町本作“碧韵”。

按，“鸣流”，溪声也，若“响韵”，义重复，“碧韵”，喻水之清澈，何良俊《无题》诗云：“云仪冉冉朝日，碧韵娟娟晚风。”又曹元忠《金缕曲》：“曾照眉峰颦碧韵。”此处当以钞本为是。

从版本与题录上看，钞本与吴正子本应是同一系统的本子，但也保存了一

①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第十七云“或问：‘一夜何故五更？更何所训？’答曰：‘汉、魏以来，谓为甲夜、乙夜、丙夜、丁夜、戊夜，又云鼓，一鼓、二鼓、三鼓、四鼓、五鼓，亦云一更、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，皆以五为节。’……冬夏之月，虽复长短参差，然辰间辽阔，盈不过六，缩不至四，进退常在五者之间。更，历也，经也，故曰五更尔。”

②但也有持反对意见者，如宋程大昌《演繁露·六更》云：“其实宫鼓以外间四更促为五更，故五鼓终竟时，蚤于外间耳，鼓节未尝溢六也。”俞樾也同样认为宋制无六更，见其《茶香室四钞》卷八《宋制并无六更》。

些珍贵的异文资料。在此我们仅就钞本的文本校勘情况作简单的介绍,而它在日本的传衍及影响尚待进一步探究。

二、《李长吉歌诗》评点本

评点底本为王琦汇解《李长吉歌诗》,乾隆二十五年(1760)宝笏楼藏版,四卷,四册,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。该书板框13.3×17.1cm,十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左右双边,单黑鱼尾,版心上镌书名,中镌卷次,序文天头处有“特殊研究□成费图书之印”。何人批点,尚不清楚,唯第二册《南山田中行》诗中释“鬼灯”为“ホツキ”,或是东瀛学者所为。批点以朱笔眉批为主,夹批为辅,行楷书写,字体方正浑厚。从批语来看,既注重诗句文献的辨析,又能于细微之处阐述诗法起承转合之妙,细加归纳,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:

其一,版本的辨析与典章故实的考述。批本用东瀛李贺诗集的各种版本对王琦《李长吉歌诗》进行校勘比对,如《评注诸家姓氏爵里考》批曰:

吴正子注本有日刻本,盖文政年间仿元版者云。徐渭,工墨花,诗亦可。徐渭、董懋策注本,辑在《董氏丛书》中,易购得,此丛书是董氏家塾本也,中有董懋策传,引《会稽县志》,详。吴正子注虽简单,甚得要。吴、徐、姚及王注,有此四注,足矣。

王琦《姓氏爵里考》虽提及《昌谷诗注》中有董、徐合注,但董懋策爵里未详。批本则从《董氏丛书》及《会稽县志》中加以辑引。另据批语可知,日本文政年间曾翻刻元版吴本《唐李长吉歌诗》。若东瀛真有元版吴本的流传,那么极有可能是室町钞本的依据。此外,河田黒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三十二载有《李贺歌诗编》影宋钞本及吴正子笺注、刘辰翁评点《李长吉歌诗》的明刊抄本,可见李贺诗集在日本多有流传。

批本还对长吉诗歌的一些故实进行了相应考释,如《示弟》“何须问牛马,抛掷任枭卢”,方扶南《批本李长吉诗集》云:“朴语浓结,牛马即呼卢中名色。”王琦则引李翱《五木经》“王采四、采六”与程大昌《演繁露》“犊雉、呼卢”之说辩述李贺的“牛马枭卢”。而批本则又对王氏所说进行相应的考论,云:“事命不常,运命不定,牛马枭卢,都樗蒲之语。《五木经》注曰:厥二作雉,背雉作牛,以此观之,牛三白二恐是牛二白三欤?若有黑上画牛者三,则谓牛三白二,亦通。又考之,三黑上画牛,二牛之反面上画雉,则意都通。如果牛不是有三,而犊是牛二白三,则不可解。白三牛二曰撅,盖白三元二,亦不可为牛二白三。然则犊与撅实异同,于理不能有此事。”又《竹》诗“三梁曾入用,一节奉王孙”,批本云:“一节本王孙谓以节送人欤?送愁□这一节,《史记·赵世家》有故事,竹之两节之间有神符,或用此故事欤?”另批本用元曲《货郎旦》卷一中“解库存活,草堂工课”释《南园十三首》其三“自课越佣能种瓜”。这些典故的诠释,皆较为准确通达。

其二,音注释词与行文章法的分析。批本为东瀛学者所作,评点多音注释

词,如《追和柳恽》:“朱楼,酒家或非自家。柳恽,于粉切。萍,反寅切。栌,查,山查子。蛷,山颊切。箬,日若切。轸,止引切。水陌,水路。”《马诗二十三首》其十三:“批,削。凡兽之耳,才生下来时,歪而不立,过几日始成形,初攒谓之。”又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》之十一月:“挝,姑倭切,击挝钟,音乐盛。战却,打倒寒也。”与这些字词音义的阐释甄别相比,批文对诗句章法结构的分析则略少了些,但不乏中肯之言。如批《过华清宫》后四句曰:“以上写实景,下二句述诗人之心。”评《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》“述事有顺序”;评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》之二月“金翘以下承头句采桑津饮酒之事”。

其三,域外特色。批本眉批夹以日文释义,旁批多片假名注音。这应是东瀛汉籍笺注评点的基本形式,另在释义时也多域外故实,如《同沈驸马赋得御沟水》中以朝鲜新罗时的鲍石亭佐证“停杯泛小觞”的流觞亭。此外,批本的释句颇具俳句的风味,如上题与沈驸马入苑聚饮时释言:“至到流浪处,忽然偶见驸马,驸马美貌看水中影。”又《贵公子夜阑曲》:“日将暮,漫天夕霞美。吹刺叭,红旗打鼓,寒烈霜重,城将决意,而时打葫芦。”与国内李贺诗歌的各种笺注评点相比,批本多音注释词与文意的疏解,简陋之处时而有之,甚至有不可解的地方。如上文中“时打葫芦”之语,又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序》“离绝远去”释为“言其离普通风俗之诗法”等。考虑这是域外汉籍的批点,讹误在所难免,但从文献勘误及释义来看,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与理论价值。

本文对日本室町钞本《李长吉歌诗》以及王琦汇解《李长吉歌诗》批本进行考述辑录,一则补李贺诗歌校勘之阙遗,另则期望学界对李诗在东瀛的传承历史及学术形态予以更多的关注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